

Visual  
Reformation:  
the Sectional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Fine  
Arts in 20th  
Century

胡斌 著

# 视觉的改造

## 20世纪中国美术的切面解读



# 视觉的改造

## 20世纪中国美术的切面解读

胡 斌 著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视觉的改造：20世纪中国美术的切面解读/胡斌著.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7

ISBN 978-7-218-10909-1

I. ①视… II. ①胡… III. ①美术评论—中国—现代—文集  
IV. ①J05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25403号

Shijue De Gaizao

## 视觉的改造：

20世纪中国美术的切面解读 胡斌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人：曾莹

责任编辑：古海阳

特约编辑：张小云

装帧设计：卢珊

排 版：广州市友间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责任技编：易志华

出版发行：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10号（邮政编码：510102）

电 话：（020）83798714（总编室）

传 真：（020）83780199

网 址：<http://www.gdpph.com>

印 刷：广州市人杰彩印厂

开 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 张：11 字 数：163千

版 次：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30.00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020）83795240

# 自序

近些年来，我自称一直在使力的一个研究方向就是革命美术。“革命美术”并非十分严格的概念界定，按照郑工研究员在其著作中的说法，它泛指20世纪以来在革命的政治化运动中自身蕴涵的各种文化成分被政治力量整合的中国美术形态。此本文集定名为“视觉的改造”，便是试图以个案研究的方式探讨在革命的政治化运动中，美术图像所形成的特点和模式，以及与社会、思想改造之间的系统性关联。

进入这一研究领域，既存在偶然因素，又具有必然原因。读本科的时候，我对女性主义理论感兴趣，总想拿个对象物来实验一下自己所学到的那些理论。本想尝试做当代女性艺术的研究，但当代女性创作纷繁芜杂且缺乏历史距离，我感觉难以把控，后来便将阐述对象往前推到了“文革”那个特殊的阶段，即变成对“文革”绘画中的女性形象研究。当时的指导老师李公明教授对20世纪中国政治史有着深刻的认识和浓厚的兴趣，他鼓励我做这个课题，同时我也就此课题征询过其他老师的意见，阅读了不少女性主义理论的书籍和“文革”时期有关的报刊。现在看来，这篇论文因为范围过宽、文献爬梳和理论认识不够，略显单薄，但这一写作将我的关注点带到了革命美术的领域。

可以说，出于种种原因，革命美术研究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还停留在简单的资料铺设、风格形式分析、画种分类研究、美学探讨，以及从社会学等视角出发的浅层次操作层面。邹跃进教授曾在介绍该领域的研究状况时说，其尚处于各自为政的研究状态，相互之间没有形成一种相互批评、借鉴的机制和具有关联性的集中的话题探讨。随着革命史和相关资料的不断开掘以及由此引发的对于众多史实颠覆性的新认识时，革命美术的许多阐释便不得不进行更为细微的剖析，从而揭示出其中的种种问题。朱青生教授曾在评述“文革”美术研究

时说道：“对一个如此复杂的、充满疑难的课题，而以不提问题的方式只做中性陈述，这本身是个问题。”其实没有透析出问题的美术史何止“文革”这一段。

本科毕业后，我在广东美术馆从事编辑和研究工作。工作期间，我自认为承担的最有意义的任务之一，就是担任由邹跃进、李公明、王璜生策划的“毛泽东时代美术（1942—1976）文献展”的策展助理，协助大型图录、展览、研讨会的组织工作。配合此次展览的研讨会，是革命美术领域一次规模较大、学术力量较为集中的专题研讨会。会议试图凭借相应的历史距离和两个时代的意义差异以及在中国当代学术发展中积累的丰富资源，较为深入地开展有关毛泽东时代美术的史学与理论研究。会议不仅邀请了美术圈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还邀请了历史学界、文化界、思想界的重要学者参会。这次会议给予我深刻影响，之后本人写作的多篇文章皆与此会上展开的议题有一定关联。

其时，我正在准备的硕士毕业论文的主题是：关于农民与地主斗争的图像研究。而我的硕士导师李公明教授提交的长篇会议论文就是农民一地主题材的图像学分析。他建议我就此论题继续深入下去，并对我以后的写作给予了长期指导。那次会上，杨小彦教授、冯原教授提交的论文也与此主题有密切关系，切入的角度却又迥然有别。我多次就革命美术图像分析的问题求教于杨老师，他对这一领域也具有持续的研究兴趣和独特的看法。于是，我之后在多篇论文的写作上亦受益于他。

在写作的过程中，我逐渐形成的研究方式是：把革命美术图像的生成置于广泛的社会、政治、文化语境当中予以审视。图史互证，将图像所呈现的内容与文献史实进行对照只是第一步；第二步，尤为重要的，我们要分析图像语言的具体特点以及与社会机制之间的关系；此外，我们还要揭示在图像系统生成过程中，图像的制作者，即艺术家所遭遇到的身体与精神的历练。在这些研究中，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我绝不是将图像仅仅视作某段历史的佐证材料，而是始终以图像语言作为核心研究的对象；也并非像视觉文化研究那样，完全消解了既有的艺术的界定，我仍然会考虑到艺术品的高低，只不过，我是基于某种历史语境来看待这个问题。

目前收入文集的九篇论文，是我近十年断断续续革命美术写作的部分成果，或为毕业论文，或为研讨会交稿，大部分文字均已经发表。因为我同时还从事其他活动，每次的写作都显得很仓促，但成文之后，我会一直念叨着这个主题，遇到相关的资料便随时收录，以待日后修订。我们知道，围绕20世纪革命美术的政治及图像资料异常庞杂，每逢写作，均有某种强烈的无力感，我只能时时留意，以期望略微弥补仓促写作的种种不足。要不是与我一直保持写作交流的鲁明军兄发来文集组稿的邀请，我可能很难下定决心将这些旧稿汇集出版。之后的出版多有波折，感谢在此过程中帮助我的朋友们以及最后促成此书出版的广东人民出版社。

之所以坚持在此领域用功，除了自己的兴趣以及目前研究的不足（最近几年有一些硕博士论文和研讨会论文以此论域为题，已经稍微填补了研究的缺失），受一些师友的精神感召，我在当中还保留着一份也许有些天真的想法。社会光怪陆离的程度已经大大超过了我们的想象，我们亦卷入其中不辨方向。我觉得，当下中国的很多问题离不开前一个阶段的历史投射，因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左右，我们对于20世纪的政治运动尤其是红色革命还存在诸多遮蔽，而图像无疑是铸就人们对历史的感观认识的重要方面，我希望通过这样带有去蔽性质的研究对现实形成某种哪怕是极其微小的影响。这或许是作为当代社会中弱小个体的一点理想吧。

胡斌

# 目录

## 专论

- 002 运动与斗争的图像建构
- 053 延安时期古元版画创作理路的历史语境
- 067 思想改造情境中的语言变革与东西文化之思
- 082 漫画中的胡风批判与 20 世纪 50 年代中国漫画的取向
- 099 “超人英雄” 欧阳海的视觉形象塑造及其历史语境
- 113 从性别视角解读“文革” 绘画中的女性形象

## 书评

- 134 “唤醒中国”的政治与艺术
- 145 中国近现代乡村史的新探索对革命美术研究的启示
- 154 关于西方美术对近世中国美术影响的几点思考

# 专论

# 运动与斗争的图像建构

## ——以解放区土改斗争会图像研究为中心

土改斗争会图像作为一种斗争地主的场景描绘是在中共革命历程中出现的题材。中共所领导的土地改革从其成立以来就开始了，但斗争会作为其重要的斗争手法经历了一段时间才渐趋成型。因为抗战局势的发展以及革命文艺思潮的影响，抗日战争时期，美术家们纷纷走向农村，从而丰富了解放区的美术创作，也勾连起了知识分子与民间两个不同图像创作系统的融合和变革。在这时的解放区的绘画作品中，有了大量反映土地改革的题材出现，表现土改斗争会的图像也凸显出来。

将土改斗争会这样一个历史现象作为分析对象，可以免于过于直接地进入农民—地主二元对立的分析模式当中，同时它是农民与地主有组织冲突的关键环节，透过这一渗入斗争哲学、民间仪式、法律申诉等因素的场景，能够折射出其时代多个方面的境况；以此为题材的图像也涵括了场景表达的转型、斗争意识形态的融入、民间因素的潜藏等多方面的因素。<sup>[1]</sup>

在研究土改斗争会图像时，首先的工作应是剖析图像与历史最为深层的对应关系。随着中国革命史和乡村史研究新成果的取得，将土改斗争会图像与重新挖掘的土改现实对照，我们可以厘析出图像话语与历史的关系。在近现代史中经常呈现出来的事实是，图像所反映的史实可能还远不及文本资料翔实完整，这样的图像描述往往变成与近现代史实对应的一种“图说”，而且，由于革命美术往往采取的现实主义手法本身具有一种“逼真性”，这种逼真性使得人们在对这些图像进行解释时，极为自然地就将图像与现实对等了起来，那些

复杂的历史情形是不能够从图画中直接读解到的。但也正因为如此，在借助了社会学或乡村史的资料及研究成果时，我们才能深刻地明白到，图像话语在塑造建构现实方面的特点，它树立和推崇了什么，又规避了什么？

由此，我们进入对于土改斗争会图像的另一阐释层面，即研究分析图像的母题和构图特征等因素所体现的表意系统。以此种研究思路，我们需要对土改斗争会图像的特征符号进行分析，阐释其来源和指示意义，分辨出其中隐含的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话语，从而揭示出政治话语诉诸审美形式的方式；同时又在一个广阔的文化情境（民间文化形态、知识分子叙述、意识形态话语）和类型（图像、文学）当中阐述此多种因素在图像中磨合铸造的轨迹。

最后，我们不得不将土改斗争会图像表述者本身所遭受的特殊经历——思想改造与土改实践，作为本文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为从无论是保留了思想挣扎的痕迹还是彻底消退了内心“异端”念头的回忆，我们都能够觉察到这一步骤对于那个时代的美术家们的特殊意义。以此，也能够加深对上两部分内容心理学意义上的理解。

## 一、土改斗争会的图像与历史

### （一）土改斗争会的思想来源与早期状况

#### 1. 土改斗争会与农村阶级斗争

斗争会曾是中共革命意识形态中运用极为广泛的一种制造和解决冲突的群体斗争方式。美国斯坦因《红色中国的挑战》中自编的《共产党用语词典》是这样描述斗争会的：“有时在党及政府机构、军队、学校、工厂中召开，一切阶级人员利用自由公开的讨论，以求达成改进，调整歧见，处理若干个人（不论地位如何）的错误。互相批评，自我批判是这些会议的特色。”<sup>[2]</sup>从中共文艺的图像资料以及中共革命史的研究中，我们都可以得知，斗争会无疑是一种严厉的阶级斗争，经常伴随着以“人民法庭”名义的群众公审。<sup>[3]</sup>

土改斗争会是与农村中的阶级斗争紧密相连的。马列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有一个发展、完善的过程。马克思主义最初指出的主要城市资本主义关系中

的阶级对立，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并没有解决小生产的农村中其他形式的阶级、阶层分析问题。到19世纪末，随着各种小资产阶级—农民政治流派的活跃，农民问题日渐频繁地被提起，在恩格斯晚年的重要著作——《法德农民问题》，才首次根据西欧农民在生产关系中的地位将其分成农业无产阶级、小农、中农与大农等阶级。列宁发展了恩格斯所阐述的方法，在其著作《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从耕地、牲畜、土地租佃、雇佣关系、收支状况等不同角度对农村各阶级经济状况进行了论证，但他并没有为各阶级确定明确的划分标准。<sup>[4]</sup>按列宁主义的依照社会人群对生产资料的占有情况，分成不同的阶级这样一种“阶级观点”理念，在对于农民问题的理论上并不太健全，俄国革命的实践对农民和农村也同样不算成功。<sup>[5]</sup>

在毛泽东的著作中，1933年为解决土地问题而写的，曾由当时中央工农民主政府通过作为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勾勒了思考农村阶级关系的两条主线：租佃和雇佣。以这两条主线来划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成分的这种具备宏观历史理论法则的阶级分析，还简洁地体现在毛泽东仿效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之中，个体被预期依据其阶级利益而行动，作为无产阶级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是领导阶级革命的组织者；贫雇农是革命最积极的响应者；下中农作为关键性的中间阶层，被认为是易于动摇的，需要争取的对象。<sup>[6]</sup>这种“对立”分析观点对农村阶级的阐释是一早就反映出来的，如：“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绝大部分半自耕农、贫农、小手工业者、店员、小贩）、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亲近的朋友。”（1925年）<sup>[7]</sup>他常以敌人／朋友、革命／反革命、反对／拥护的绝对对立的思想方法，明确的排他性和不容辨别性的措辞来表明，阶级斗争是社会生活的本质这样的信念。<sup>[8]</sup>

中共在地主与农民的冲突关系中的组织运用与苏联清理富农的阶级斗争形式有着很大的相似性。苏联1928、1929年进行的大规模组织贫农团，引导他们参加选举，工人下乡帮助贫农，与中共在土地改革中的组织步骤是基本一

致的，不同的是，苏联对于富农主要采取的是大规模暴力镇压与剥夺，使富农经济“自行消灭”，<sup>[9]</sup>而中共主要采取群众斗争的形式，更加强调发动群众和引导群众强烈的控诉。

中共土改斗争会就是依据农村中阶级对立的构建而组织的与地主面对面的群众斗争。当然，它的斗争方式无疑仍然借助了以往暴力革命心理因素，并暗合了旧有的民间仪式效应，与旧的斗争方式保持着必然的联系。

## 2. 土改斗争会的早期状况与相关图像

在中国传统的抗租斗争中，佃农已经形成了一套和平（如请地主吃饭协商减租）和暴力（如吃大户）的斗争方式，政府的调解措施在协调佃农与地主关系上也给予了一定保证。<sup>[10]</sup>土改斗争会是在中共革命历程中诞生的新的斗争形式。它不同于以往自发的或处于弱势的组织反抗，而是在党的政权力量的支持下为着凸显面对面斗争以组织群众而迫使地主屈服的强势斗争。在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统计出农民从政治上打击地主的各项方法：清算、罚款、捐款、小质问、大示威、戴高帽子游乡、关进县监狱、驱逐、枪毙。这一套方法显然是混合了西德尼·塔罗所说的新旧斗争形式，而其中的清算、质问则已经具备了土改斗争会的组成因素。<sup>[11]</sup>对于农民斗争地主的许多激烈行为，当时有不少反对意见。<sup>[12]</sup>与之不同的是，毛泽东则突出说明了“从政治上打击地主”的重要性：“农民有了组织之后，第一个行动，便是从政治上把地主阶级特别是土豪劣绅的威风打下去，即是从农村的社会地位上把地主权力打下去，把农民权力长上来。”对“所谓‘过分’的问题”，他认为：“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非如此决不能镇压农村反革命的活动，决不能打倒绅权。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sup>[13]</sup>毛泽东的这些话，在以后多次的群众运动中，都被一再引用和作为指导方针。

国共两党决裂后，农民和土地问题便成为两党的分界和斗争的一个关键点。共产党建立的乡村苏维埃政权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将土地斗争与武装夺权进一步结合起来。苏区的社会被各种名目的群众组织（包括贫农团、农民协会）组装起来，进行军事管理、训练与开会教育，以此向农民输入阶级政治观念，高度动员他们集中有力地开展集会和游行等斗争形式。<sup>[14]</sup>依

靠土地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的建设的实践和相应的宣传，贫富阶级对立的阶级意识得以形成；依靠与国民党及地主武装拼杀的实践以及不断的灌输，现实斗争和宣传鼓动自然结合，农民被培养起了基于阶级仇恨的革命精神。<sup>[15]</sup>

与此同时，土改斗争的现实情况在图像中有没有反映呢？五四以后，受革命激进思想和新文化思潮的影响，反映社会苦难与抗拒压迫的带有强烈斗争倾向的美术作品（主要以木刻的形式）涌现出来，至20世纪30年代初的左翼的时代美术社则明确宣称，美术须是“对压迫阶级的一种阶级意识的反攻”，是“阶级斗争的一种武器”。这些处于城市中的激进艺术家所表现的群众斗争的图像主要是常见的城市民众抗争的罢工、街头暴动的场景。左翼美术家联盟的成立大会则讨论了如何使作品接近劳苦大众以及如何支援中央苏区的问题。<sup>[16]</sup>伴随着强烈的社会批判性思潮，一些左翼的美术家也将目光瞄向了农民的斗争运动，比如1933年黄新波的连续画木刻《平凡的故事》就描绘了农民自发的暴力抗租的情形，1934年温涛的《咆哮》（图1）描绘了带有组织性的农民造反，这些与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自发的农民骚乱、暴动是相对应的。<sup>[17]</sup>只是他们的作品还没有真正深入到民间，与农民发生直接的联系，从画面组织和情绪上看，他们的思想资源主要来自对西方的斗争图像和平民暴动模式的汲取。

那么，农村的土改斗争图像宣传又是如何一种光景呢？在中共农民运动初期，各省农会在党的领导下，十分重视宣传教育，纷纷出版农民画报，向农民灌输革命思想。比如宣传工作极为活跃的广东农会，绘制了各种壁画、标语，出版了小丛书、定期刊物《犁头周报》等。他们的宣传画《快乐的聚宴》以“人肉宴席”的形象画面表述帝国主义、附庸田主、土豪、军阀、买办吸取工农大众的血汗，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情形。《苦乐不均》（图2）以对比的手法表现了农民常年劳苦不得温饱，而地主凭借田契和租簿不事劳作却过着丰裕生活的不平等现象。他们将矛头指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而且注意结合本省农民所受苦难，非常具有震撼力。<sup>[18]</sup>

其后中共所领导的苏区美术活动，鉴于斗争形势的需要，所采取的形式也主要为壁画、标语画、传单画、插图、画报等。其中有关土地问题的图画，如《春荒斗争画报》第一期，共有四幅画：《豪绅地主抬价闭粜》《春荒时候劳



图1 《咆哮》(温涛,木刻,193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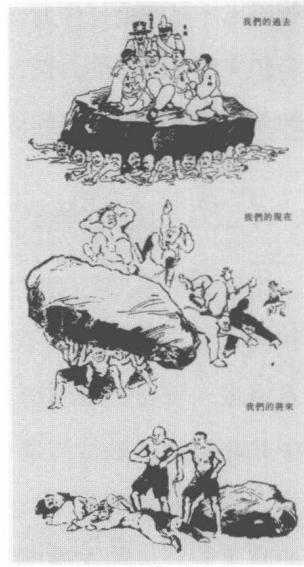


图2 《苦乐不均》(广东农会宣传画)

苦群众的苦况》《国民党豪绅地主武装进攻苏区造成春荒的一幕》《帮助白区群众解决春荒问题》。识字课本的插图也注意贯彻对群众的思想教育。儿童刊物《时刻准备着》在“田”字下画了三幅画，中间一幅画了田和房屋，农民们荷着锄头去种田，这是田字的图解；左边一幅是表现苏区农民，捧着大米；右边一幅是画着白区农民套着链子，链子上写着苛捐杂税，下面题着一首歌谣：“苏区农民分了田，快乐如神仙，白区农民没饭吃，哭涟涟，只有革命才是出头天。”<sup>[19]</sup>苏区美术的创作环境极其艰苦，承担宣传工作的多为战士、农民，发表时大都不署名。

总的来看，农民运动中的美术作品在制作上还比较稚拙，但它表现出了明确的政治目的，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明确的阶级倾向性，是革命运动中的宣传武器。这些作品还经常采用鲜明的对比的方法，将不同阶级、阶层的生活状况，或同一人物在革命前后的经历和斗争事迹、同一时期工作的先进与落后进行对比，唤起群众强烈的革命热情。而且它的艺术语言通俗易懂，有些还利用画中人的对话表达创作意图，还有很多采用画与歌谣互相结合的形式，反映了大众的思想感情，和当时的政治斗争密切结合，具有广泛的普及性。不过既然

这些美术作品完全是作为一项政治宣传的策略，它力求迅速简洁地展现社会的矛盾和突出了革命的力量，从而激发起群众的革命斗志，而具体复杂的土地改革的斗争场景则没有得到详细的表达。

## （二）抗日战争时期的土改斗争会图像表述与历史状况

抗日战争时期，受时局的催逼和文艺宣传的鼓动，不少左翼美术家进入农村，来到解放区。而中共在解放区进行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便是土地改革，作为对党的政策的宣传的绘画图像，也因此出现了大量反映土地改革的题材，土改斗争会即在其列。依

据当时的土改政策，主要是以表现减租斗争为主。比如江丰的木刻《清算斗争》（1942年），古元的木刻《减租会》（1943年）（图3），徐立森的年画《减租说理》。

在《清算斗争》中，画面上的农民们都争先恐后地要与地主理论，而备觉孤立的地主仍然尽力为自己作着辩解；桌子上摆放的账本和算盘表明“清算”<sup>[20]</sup>的具体含义。而《减租会》是堪称典范的一幅作品，描绘的是农民与地主面对面的减租斗争，农民将地主团团围住，有人直指其面，有人在按指逐条分析，有人拿出账本，有人在交头议论，有人在吸烟沉思，抱着婴孩的妇女也参加了会议，地主被围困在中间，一手抚怀，一手指天，替自己作着辩解。人物众多，但表情神态各异，形象动作无一不鲜明生动，既符合了主题揭示的需要，又没有扭曲真实的面貌；陈设道具皆富于典型性，画面黑白对比处理精到，组织布局张弛有度，场面戏剧感强。

此外，一些连环画、插图也涉及土改斗争会的场景。任迁乔的连环画《翻身》（1942年）描述了山东莒县贫农王五，受尽恶霸庄阎王的压榨，后来在抗日民主政府领导下，斗倒了庄阎王，实行减租减息，生活才变了样，王



图3 《减租会》（古元，木刻，1943年）

五还当了农救会主任，团结群众，共同抗日的故事。刘旷的《白毛女》插图（1945年）则是配合戏剧文学描述遭受欺侮压迫的“白毛女”在党的帮助下斗争恶霸地主黄世仁，得以复仇的故事。

回顾抗战时期中共的土地政策，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中共重新协调经济和政治的目标和手段，将土地革命和武装夺权转变为建立统一战线与国民党合作抗日，相应地，将没收地主土地改变为减租减息。<sup>[21]</sup>为了更广泛地团结各阶层的人抗击日军，共产党人在抗日根据地所做的许多努力，有一种向传统复归的倾向。大革命时期那种火药味十足的阶级斗争被弱化，而弘扬“公道”，称颂“好绅好人”，推崇正直、勤劳、廉洁的品格，打击“坏绅坏人”，抨击抽大烟的、二流子懒汉，以及各种道德败坏的行为成为斗争与文化表现的主流特征，而火药味主要集中在对日军和汉奸的攻击上。<sup>[22]</sup>从这时的某些摄影（图4），我们也可以了解到这一时期斗争与控诉的场景。抗日战争时期各根据地以党的土地政策为依据确立了土地立法，将减租与交租的租佃关系、借贷关系以及相关的土地所有权关系和土地债务纠纷的调处与仲裁等基本内容确定下来，而在根据地政权中形成的司法制度，也包括审判权由司法机关统一行使，逮捕人犯只能由公安司法机关依法执行；废止肉刑，严禁逼供信，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等原则<sup>[23]</sup>，这些政策法规对斗争地主的形式和程度起到了约束作用，但当时推崇的群众路线的审判方式和人民调解制度，实际上又为发动群众斗争提供了依据。



图4 1945年农民进行减租减息（钟焕天摄）

黄宗智指出土改的官方建构与农村的客观现实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偏离。不过黄氏认为，1937—1945年的老解放区，使用“统一战线”的“减租减息”政策，而非暴烈的阶级革命的方法，算是理论和行动表现得最为统一的时期。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向地主清算，要求退回多交的地租，并且采取斗争会的形式与地主针锋相对也是被鼓励的，只是这种斗争被有效地约束在一定范围内。<sup>[24]</sup>当根据地面临日渐缩小的生存压力时，彻底地争取群众的要求也就迫使加强斗争的力度。1943年毛泽东在写给党内的指示说：“减租是农民的群众斗争，党的指示和政府的法令是领导和帮助这个群众斗争，而不是给群众以恩赐。凡不发动群众积极性的恩赐减租，是不正确的，其结果是不巩固的。”<sup>[25]</sup>

更为直接的证据显示，1942年2月6日专门对党内发出的《中央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补充了之前的1月28日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它首先强调了那个决定的“基本精神是先要能够把广大农民群众发动起来……在群众真正发动起来后，又要让地主能够生存下去”。其策略就是对地主先打后拉，拉拉打打。干部要“熟悉拉中有打的策略”，特别是在发动群众、实行“打”的阶段，不但“左”的过火行为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只要“真正是最广大群众自愿自觉的行动”，“则不但无害，而且有益”；然后说服群众、纠正过左，使地主“感恩怀德，愿与我们合作”；在减租问题上，发动群众的手段就是允许农民清算旧账，包括算公账和私账。<sup>[26]</sup>因此，重要的是将民众动员起来，为该阶段的革命任务服务，不同的革命任务决定了斗争体现的方式的差别，并不十分在乎其与客观性现实的相符与否。

但如果只从相关图像来看便难以洞察其中的奥秘。在《清算斗争》和《减租会》画面中，不管场面如何激烈，作者还是力图营造一种说理斗争的氛围。<sup>[27]</sup>说理掩盖了斗争的尖锐性，尽管是组织起来的农民难道就变得伶牙俐齿，而地主反而笨口拙舌了吗？

这背后是大有其原因的。1942年夏秋以后，在中共中央关于减租减息运动中斗争策略的指示下，各抗日根据地在发动农民开展减租减息斗争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对地主又团结又斗争的策略。这些策略包括：第一，遵循争